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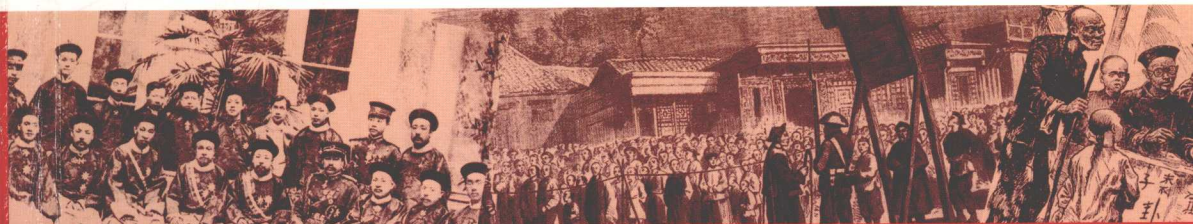


辛亥：计划外革命

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澳大利亚] 雪珥·著

改革太快太猛，社会失控，
改革代价承受者们成了社会离心力量



经济掀翻政治

晚清政改的不归路

中华女子学院



0406499

图书馆



中国妇女出版社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PRESS

1257.07
9

辛亥：计划外革命

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澳大利亚] 雪珥·著



中华女子学院



0406499

中国书画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 (澳)
雪珥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146-0113-8

I. ①辛… II. ①雪…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5591号

特约编辑：程军川 丁 健

封面设计：利 锐

版式设计：付 莉

辛亥：计划外革命 ——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

出 版 人：田 辉

著 者：(澳)雪珥

责任编辑：王少娟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邮编：100048)

电 话：88417359 (总编室兼传真) 68469781 (发行部)
88417417 (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cpph1985@126.com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0.5

版 次：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6-0113-8

定 价：35.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 自序 |

国运之“运”

1

落雨大，水浸街。

尽管北京已经严寒料峭，此时的广州却依然春光四溢。为了看看流光溢彩的“新”珠江，我们彻底地陷入了车的洪流，无法动弹。刚刚散场的亚运开幕彩排，令这座城市high到了极点，血脉贲张，到处都是高潮之后的疲态。

广州的朋友们尽管感觉到“盛会”带来巨大不便，却都还在坚守家园和工作岗位。“要知搵银最艰难，双眼通红声沙晒”，在北京2008年相当普遍的“避运”行为（避开奥运到外地），广州人做不到，为了生存，只能“受运”。

2

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受运”、“避运”，没有根本的区别。在“运”的洪流中，除了随波逐流，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被“小日本”打趴下的“大中国”，痛定思痛，朝野上下认定了“只有”制度层面的变革，“才能”救亡图

存。问题在于，他们几乎又同时认定，“只要”制度层面的变革，“就能”救亡图存。制度变革与救亡图存的关系，从“只有-才”的必要条件，变成为“只要-就”的充分条件，逻辑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之前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中对涉及国防、民生等基本面的关注退居二线，甚至消失了。人们都指望着通过体制上的改革，引进或建立一种什么主义，就可一举富国强民，全社会的资源被畸形地投放到这场“寻宝”运动中，自此清王朝进入了“主义”超越“问题”的运动年代，人们前赴后继地“转运”、“倒运”或“败运”，周而复始，绵绵不绝。

戊戌变法就是在极度的失落后一次盲目而操切的“转运”。光绪皇帝及其身边的一小撮年轻干部（即“四小军机”）儿戏般地发出了一百多道改革诏令，以文字上虚幻的快感取代了改革应有的审慎。而资历极浅的改革者们贸然地将重点放在了打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们的铁饭碗上。这种从组织人事上入手的休克疗法，令全国公务员尤其是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们人人自危，将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改革的对立面。再加上康梁师徒为了争夺眼球，一味鼓噪，铺天盖地的“敏感词”深深刺激着官僚机器的神经，这场变法终于成为变法者自己的绞索。反改革势力全面回潮后，甚至在国际事务上也不再韬光养晦，贸然出击，两年内就酿成了义和团运动，乃至八国联军入侵。从1898年的“极右”到1900年的“极左”，中国在表面上似乎进行U形大转弯，但其实背后是相同的进退失据。

3

在1901年逃亡途中，大清中央政府宣示了继续改革的决心，随

后发现，各项改革都难以推进，处处掣肘。几番折腾，多方考察，支付了巨额的“学费”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推行宪政，成了大清中央政府的基本共识。当载泽、端方等人周游欧美、考察宪政回京之后，他们的一句话令慈禧太后悚然动容：宪政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保皇上世袭罔替”。在这么强烈的诱惑面前，老佛爷下决心来次政治体制大改革。随后，从干部人事体制改革（官制改革）入手，大清开始“政改保胎”。

执政者是真诚地希望通过扩大执政基础、开放政权来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资源及民意支持。其所设定的9年预备立宪期被后世长期作为“假立宪”的证据，但这一期限不仅远远短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且也被其批判者日后的行为所证实是必要的：抨击清廷“假立宪”的同盟会在以国民党的名义执政后，干脆将立宪过程分解成了军政、训政和宪政，远比起曾经痛斥的大清王朝更为“稳健”。

在当时，“改革”已经成了大清国的主流语汇。无论庙堂还是江湖、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改革的最大阻力早已不在于反改革的保守势力，而在于改革的旗号被滥用，成为权力斗争的新幌子。

宪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以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为诉求的地方议会（谘议局）最为关键。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诸侯权力膨胀，在组织人事、金融财政乃至军队建设和调动等各方面都对中央政府处处掣肘，成为政权建设的心腹之患。地方谘议局成立后，很快就对地方行政机构形成了巨大的钳制。

几次较量下来，地方督抚纷纷转而与谘议局合作，地方政权的执政基础得以迅速扩大。但是，合流后的地方势力却迅速将目标转向了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配争夺上，中央政府与地方的矛盾更趋激烈，而且因为夹着谘议局这样的“民意机构”，动辄以人民的名义向中央政府发难（这在四川保路运动中最为明显，“7000万川民”成为地方势

力的口头禅），中央政府在这些争斗中节节败退。

4

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冲突，加上中央政府日益微弱的掌控全局的能力，是导致清王朝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宪政与否只是一层外包装而已。

在权力的逐鹿场上，执政者与在野者的考量角度是不同的：在执政者眼中，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不可能发展；而在在野者眼中，浑水才能摸鱼，越乱越有机会。章太炎就毫不隐晦地说过“但愿满人多桀纣”，因为如果满人中出了尧舜，革命就没机会了，执政者越腐败越好、越残暴越好。在野者没有执政的包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也不需要知道柴米贵，轻装上阵，可以喊出最为动听的口号，反正自己没上台前无法验证、也无从兑现，上台之后，谁还敢来验证、要求兑现呢？

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后，刘邦感叹“大丈夫当如是”，而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这种取而代之的欲望是中国历史上主流的政治动力。晚清搞政治改革，宽容度之大史所罕见，非但没有能够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反而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离心散乱。因为，很多人趁此良机想“彼可取而代之”，无论打着什么旗号，核心目的就是夺权，主导口号就是“我能”。

打倒与推翻只能解决所有权和经营权问题，至于经营的很多具体问题，不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就能解决的。但是，从晚清直到改革开放，近七十年的社会资源除了应对外敌入侵外，被过多地耗费在了打倒与推翻的内耗、翻烧饼似的折腾，而没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文官制度、权力制衡等）及民生建设上。

无论改革还是革命，都只谈形而上，注重权力的掌控，而不关注形而下，忽视民生的提升，导致这种改革或者革命无法令普罗大众真正分享其成果，却要承担其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埋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

大清帝国的覆灭主要不在于立宪与否及立宪快慢与否，更不在于大清统治者的漠视民生，而是由于在错误的时机放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令天下群雄以为跑出来了一只鹿，纷纷追逐，将全社会特别是精英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逐鹿之上，民瘼民生当然就只能服从、服务乃至牺牲于这个“大局”。

5

体制外的在野者总在想着“砸烂一个旧世界，缔造一个新世界”，当然这个新世界必须由他说了算；体制内的当家人也未尝不想改建扩建乃至推倒重建，当然前提是自己还是主人。李鸿章之流的“裱糊匠”，很难在中国历史上“伟大”起来，因为他的职场定位实在太缺乏鸿鹄之志了——尽管中国更需要的正是“裱糊匠”，而非“拆迁队”。

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扪心自问后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家一哄而上拿石头砸死那个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说“我只是被裹挟了一次”而已。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政权垮台后，墙倒众人推，绝大多数都坚称自己“无责”，迅速地进行切割，仿佛自己从来没有在这个政权中生活过一般，账都要算在“万恶的×××”（代入原政权领导人的大名即可）身上。

6

作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我研究历史也有自己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性为中心，而不是以被夸大的神性或魔性为中心。在此中心之上，利益与权衡就是“两个基本点”，利益是外在的砝码与动力，权衡则是内在的行为与抉择。

无论是内生型改革，还是外生型革命，“自利”总是必然的第一目标。阿Q的革命理想就是摸摸小尼姑的光头、睡睡秀才娘子的大床，当然最好拖上吴妈。我相信，这才是大清国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显规则。承认显规则的存在就可能对利益进行制约，一旦显规则成了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非要把阿Q的欲望伪装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吴妈和小尼姑们就完全可能要为革命而牺牲自己，并且是默默地、或者是“被默默地”。

利益所系，小到清末上海股灾，中到四川保路运动，大到辛亥革命。利益是无数动人口号背后的真正目的。不去细细解剖这些利益的复杂细节，我们将完全迷失在历史的迷雾中。讲利益并不可笑，也不可耻，更不可怕。可笑、可耻而可怕的是，把自利隐藏起来，口蜜腹剑，听到的是口号，看到的则是拳头与棍子。

7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君”其实就是公权力、已经掌握公权力或正在追逐公权力的人，如果将“君”放在第一位，当然是“民”的灾难。当权者如此做是“民”的当下灾难，夺权

者如此想则等于是预约了“民”的下一场灾难。

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固本培元。

落雨大，水浸街……

（雪珥 记于2010年11月 悉尼-北京-广州途中）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两个女儿，Berall和Ceri，她们正在努力睁眼看中国。

【自 序】 国运之“运” / 001

【引 子】 帝国出轨 / 001

【第一章】 亡国的股灾 / 009

1910年的盛夏，大上海的股票市场遭遇股崩。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一举掏空了大清国的根基。一个叫川汉铁路公司的玩家在股崩中巨亏350万，谁都没有想到，这将给这个“老大帝国”带来致命一击。

■ 全民炒股运动 / 010

■ 美梦尽头是梦魇 / 017

【第二章】 黑幕 / 027

川汉铁路公司的资金几乎都是取自强行摊派到农民头上的“租股”。“被当股东”的7000万四川人被腐败案黑幕激怒了，他们多方上访、要求中央政府彻查……

■ 铁轨下的老鼠 / 028

■ 格老子扒粪 / 037

【第三章】 一地鸡毛 / 047

政治的口水不能当做经济的饭碗。1911年5月，清王朝“铁路国有”政策粉碎了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团的发财梦，别有用心心的表演开始了。

- “二政府”的权力 / 048
- 剁椒“杨”头 / 055

【第四章】

紫禁城面瘫 / 071

取缔“租股”，严禁用公权力强迫农民以交租的方式“被当股民”，这一减负举措被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彻底扭曲。紫禁城的脑部信号无法在帝国的脸上准确地表达出来，还有什么痛苦能比得上“面瘫”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呢？

- “盛”名之下 / 072
- 山雨欲来 / 085

【第五章】

波大无脑 / 097

地方行政长官首鼠两端，火上浇油；黑白两道通吃的富家子弟一呼百应，新成立的同志会会场里声震屋瓦、群情亢奋。时人将这场运动比喻为“大波”，但在汹涌的集体无意识波浪中，大多数的人只是盲从而已。

- “不顶不是四川人” / 098
- 护院不看家 / 107
- 潜水的老大 / 116
- 粉墨登场 / 123

【第六章】

豆豉暗杀令 / 137

一道公开的暗杀令从四川传到了北京，震惊中央政府，暗杀对象是内阁侍读大学士甘大璋。钱权两空是川汉高层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暗杀令的背后，局势日渐紧张……

- 暗杀，暗杀 / 138
- 宜昌导火线 / 148

【第七章】

皇帝门神 / 157

地方民意越发汹涌，川路公司的高层在动员民众、挑战政府等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才华”。混乱在成都罢市这一天达到顶点，已经去世两年多的光绪皇帝，活着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一幅景象上演了……

- 大帅搁浅 / 158
- 痞子运动 / 165
- 光绪罢市 / 176

【第八章】

老大同志 / 189

总督赵尔丰刚刚把运动中的代表拘捕起来，成千的“民众”就已经包围了总督府，时机契合得就好像是事先排演过的一样。数百人冲进总督府大堂，枪声响起，惨案铸成。全城戒严，“水电报”群发……

- 喋血督府 / 190
- 机关报 机关枪 / 198
- 九月围城 / 207

【第九章】

树上的猢猻 / 217

群体性事件上升为武装暴乱，“官屠”入川，太极高手作壁上观，邮传部部长盛宣怀黯然下台，四川总督赵尔丰成为弃子，与中央政府失去直接联络……

- “官屠”入川 / 218
- 狡兔未死良狗烹 / 228
- 树倒猢猻散 / 238

【第十章】

革命“投名状” / 253

端方之死是运动中的一个新高潮，他也成为在辛亥革命中少数被杀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士兵们把他的首级砍下，派人飞马送往武昌，以明心迹。随后，他的政敌赵尔丰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一个惯用他人脑袋作为“投名状”的新时代开始了……

■ 将军末路 / 254

■ 总督之死 / 266

【尾声一】

涛声依旧 / 283

【尾声二】

后来，他们的命运 / 287

【附录一】

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 291

【附录二】

天杀的公司 / 299

——大清另类出轨的一个缩影

帝国出轨

没有任何天文记载表明，1911年的第一场雪，是否比以往来得更早一些。

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昌，秋天的干燥气候还未完全退去。10月10日，极其普通的一天，一声枪响却在大清国酿成了全面雪崩：先是惊扬起几片雪花，尔后这些雪花凝成了一个雪球，继而越滚越大，声响也越来越洪亮，终于湮没了一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似乎真干净。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此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一家狭小的中餐馆内，有个人正端着盘子——他此时的头衔是“企台”（餐厅服务员），为一位名叫卢瑞连的老板打工。两个多月后，“企台”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如同巫师般准确地预言了这场雪崩的，是一位矮小的日本人，他的名字叫伊藤博文。1909年的春夏之交，伊藤博文向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宣称：三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以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为标志，伊藤博文的预测误差只有两个月。

更为重要的是，伊藤博文精确地预测了这场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中央政府权威丧失，“各省谘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各种政治势力在改革的名义下忙于争夺权势。时任日本首相的桂太郎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

“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半年后，伊藤博文到访哈尔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他告诫大清官员，要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导权并控制节奏：“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力，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三天之后，伊藤博文在“东清铁路”的枢纽、哈尔滨火车站遇刺身亡。

铁路此时已成为东北亚国际争斗的焦点，起于俄国赤塔的“东清铁路”，经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抵达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其自长春以南的路段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划归了日本，那就是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南满铁路”。

日俄之外，英、美、德、法乃至更为弱小的比利时等国都纷纷各显神



■ 清末，汉口的政府军侦察兵。他们没有侦察到迫在眉睫的危机，也许他们是佯作不知。

通，胡萝卜与大棒齐飞，争夺中国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翻开清末民初的外交史，几乎就是一部铁路争夺史。

因为关系到国家战略、战备和巨大的经济利权，铁路早已从单纯的经济问题上升为复杂的政治问题。多快好省地建设铁路，与推行以三权分立为目标的宪政，分别成为大清国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旋律。但是，这条将带领大清国“走进人间天堂”的“神奇天路”，却最终将大清国导向了死亡之路，出轨倾覆。

出轨之路，源于民营资本大举进入铁路投资带来的一地鸡毛。

1898年11月由矿务铁路总局颁布《矿务铁路章程》，就旗帜鲜明地为民营资本保驾护航：“矿路分三种办法，官办、商办、官商合办，而总不如商办。除未设局以前，业经开办者不计外，此后多得商办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预该公司事权。”矿务铁路总局被商部取代后（1903年），政府更是明确宣布对民营铁路公司“不另派监督、总办等员，以防弊窦”，同时还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在立法上将保护措施落实下来。

大清政府不仅保护民营资本，还主动向民营资本进行“政治投资”：“独立资本”在50万两以上的路矿，如果其中民营资本过半，则“应照劝赈捐之例予以优奖”，也就是说，够条件的老板们会被授予一定级别的官衔，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这在一切都要以官场级别来衡量价值的大清国，无疑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民营资本的高度重视。

1906年，在全面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官制改革）中，铁路与航



■ 伊藤博文曾四任日本内阁首相，三任枢密院议长。他精确地预言了清帝国的末日，他自己也命丧中国境内。